

陳伯達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人民出版社



陳伯達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人民出版社

書號：1208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著者：陳伯達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護土路)

45,001—95,000

定價 1,000 元

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三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目 錄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一
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	二〇
努力學習斯大林的學說是我們的任務·····	三〇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爲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而作

一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大會上說過：「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類中間，出了這位斯大林，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你們知道，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一個斯大林，那一個來發號施令呢？這真是幸事，現在世界上有了一個蘇聯，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了一個斯大林，這世界的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同志向我們中國黨的同志指出：「我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我們要學習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道理方面，一個是事業方面。」

毛澤東同志說明了斯大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功勞，說明了斯大林指導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說明了斯大林援助中國人民的事業。

時間又過了十年，現在我們在慶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壽辰。這時間，正是在人類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以蘇聯爲首的各國人民打倒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帝國之後，是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新的人民民主國家之後，是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並接着進行推翻國民黨反革命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因而得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是在蘇聯在世界上無比地強大、而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制度則正搖搖欲墜的時候，這十年來的一系列偉大歷史事變，都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的，都是和斯大林的事業分不開的，都是和斯大林對於各國人民的援助分不開的。十年來的世界歷史事變，更加說明了斯大林不但是蘇聯人民勝利的旗幟，而且是世界一切進步人類勝利的旗幟，同時也更加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在十年前所指出的：「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類中間，出了這位斯大林，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世界上有了這一位斯大林，「這真是幸事」啊！

斯大林壽辰是世界的「人日」，中國人民能和蘇聯人民一道，和世界上一切進步的人類一道，來共同慶祝這一位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在人類解放事業上聯繫最普遍、成就最寬廣的世界最偉大人物和天才導師的七十壽辰，這個慶祝本身也就是中國人民的幸事。這個慶祝本身就是慶祝人類的解放，慶祝人類的希望和將來。

但我們中國人的慶祝斯大林，還有其特殊的方面，這就是：斯大林與中國革命的密切關係，斯大林的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及其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作的偉大理論貢獻。

根據對於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斯大林，這位唯物辯證法的科學大匠，世界的革命導師，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並對之作了極端英明的論斷，粉碎了反革命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胡說八道，幫助了中國黨走上了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內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正是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結合的模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裏面有關人類命運的重大一部分，那許多著作不但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在二十幾年來的中國革命實踐中，也都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當中國人民初露出自己的革命鋒芒的時候，斯大林即已看出中國革命具有無限的力量。最近馬林科夫同志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報告裏面，曾特別引述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的一段預見：

「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種力量還沒有能使自己確當地爲人感覺出來。但是它們定會在將來使它自己被人感覺出來。看不到這種力量以及不給它們以應有估計的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們，將要因此吃大苦頭。」

斯大林這一個預見，是建立在計算中國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中國社會內部各種力量對

比的基礎上面，同時也是建立在計算世界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世界各種力量對比的基礎上面。

關於中國方面，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時候，曾經作過這樣一個重要的估計：「中國革命倡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中國農民領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斯大林這個估計，是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一點聯繫起來講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估計。因為如果是這樣，如果只有中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那末，中國農民及其他一切人民大眾，就有可能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把自己的革命力量發揮到盡致，而這個佔有地球上人口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家的人民大眾，一旦能夠作到這一點，那必然正如斯大林所說，這種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關於世界方面，顯然地，斯大林是從列寧發現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的特別尖銳化這一個著名的規律出發，因而估計到中國革命有可能跟着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繼續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的陣綫。斯大林又是從蘇聯的存在和強大這樣一個事實出發，這就是斯大林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所指出的：「……與中國並列着的，還有蘇聯存在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便利於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

因爲斯大林的預見是從堅固的科學基礎上出發，他看到了中國人民鬥爭之異常深刻

的性質，所以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中國革命曾經遇到如何重大的挫折，他都相信中國革命終將前進而取得勝利。當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斯大林即駁斥了托洛茨基派把土耳其「基馬爾式的革命」和中國革命混爲一談的胡說。斯大林分析了中國和土耳其的差別，認爲在中國沒有土耳其「基馬爾式革命」的可能。斯大林說：

「……在中國，帝國主義就必須從民族的中國之活的身體上開刀，把它分割成碎片，奪取它整個省份，以保持它們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的一部分。」因此，要是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基馬爾主義者的斬了尾巴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那末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要採取深刻地人民的和鮮明地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本身。」（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

斯大林又指出：

「在中國，不是中國的墨索里尼如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獲得勝利，後來由土地革命的浪潮，把他們沖倒；就是武漢（指當時革命的武漢而言。——伯達註）獲得勝利。」（蔣介石及其黨羽，企圖在這兩個陣營之間找一條中間路，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倒台，和張作霖、張宗昌遭受同一命運。）（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

當汪精衛接着蔣介石繼續叛變革命之後，斯大林又繼續駁斥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革命破產的胡說，而斷定中國沒有改良主義的可能。斯大林說：

「新舊軍閥相互間的混戰，又重新爆發起來，這個戰爭，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時不能不使農民破產，怨天怨地！」

「在中國還沒有這樣一個集團或這樣一個政府，這樣集團或政府能夠實行類似斯托雷賓式的改良，可用作統治集團的避雷針和續命湯！」

「要壓抑那亟欲奪得地主土地的千千萬萬的農民，並使他們對土地垂頭喪氣，那是很不容易的！」

「無產階級在勞動羣衆當中的威信，一天一天在增強着，他們的力量還是遠沒有被殲滅的。」（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事實的發生是預言的試金石。

一九二七年以來，在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變：蔣介石變成中國的墨索里尼而代替了張作霖、張宗昌，國民黨新舊軍閥互相間的不斷混戰，中國土地革命的浪潮，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任何「改良主義」企圖的破產，日本帝國主義——接着又是美帝國主義的在中國身體上開刀，中國人民同日本帝國主義及美國帝國主義作了拚命的決鬥，這種鬥爭的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蔣介石走上了與張作霖張宗昌同一命運而從反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倒下來……這一系列的事變，完全證實了斯大林二十幾年前的預見。

斯大林的預見，在二十幾年來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爭，顯出了革命科學是不可抵抗的力量，同時又暴露了托洛茨基派和一切反革命丑角替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作無恥吹

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作了這樣的概括：「今日之中國革命便是兩支革命運動的巨流——反封建殘餘的革命運動與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之匯合。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反封建殘餘鬥爭與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匯合。」（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這是斯大林精闢分析中國社會所得的結論。這是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有很大歷史意義的結論。斯大林指出：這是當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全部路線的出發點」。叛徒托洛茨基派正是反對了這樣的路線。托派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托派否認中國封建殘餘佔有優勢的作用，因而否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封建性質。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及其嘍囉們所持的這種觀點乃是反革命的張作霖與蔣介石的觀點。大家知道：中國托洛茨基派正是根據了托洛茨基全部反革命的觀點，同時又根據其關於中國問題這種反革命的觀點，而和各國托洛茨基派一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斯大林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在反對封建殘餘而已，它同時還反對帝國主義。」（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的情況從而確定這

樣的革命性質，我們黨才能正確地估計在每一個具體的歷史場合上階級關係的具體變化，以便規定革命的具體任務，組織革命的陣綫，而引導革命向前邁進，並造成中國革命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一九二七年陳獨秀機會主義就是反對了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的。陳獨秀主義後來即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合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裏不準備去多說它。這裏需要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後，二十幾年來，在我們黨內發生的或「左」或右的機會主義錯誤，也通常首先是在革命性質問題上違反了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或者疎忽了反帝這一方面，或者疎忽了反封建這一方面。例如在十年內戰期間內，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就長期疎忽了反帝這一方面，疎忽了斯大林所指出的「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其鋒芒是反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因而不善於利用形勢去正確地組織反帝的陣綫，以配合土地革命的鬥爭，而打破自己的孤立。他們在這一個時期內，並過早主張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冒險。又例如在抗日戰爭期間內，原來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轉而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的意見又正像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一樣，疎忽了反封建這一方面，「只看見資產階級」，「沒有看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底決定的意義」，「不主張放開鄉村裏的革命，害怕農民革命破壞了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綫」。當然，這種錯誤的意見也恰恰是直接反對了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因爲按照斯大林的意見乃是這樣的：「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越徹底，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

一戰後，亦將越強大越有力量。」（「論中國革命的前途」）這類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這一個時期內，既然否認了反封建這一方面，所以也就又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一樣，主張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看到資產階級的前途，而沒有看到人民革命勝利的前途與社會主義的前途。

很明顯，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是和中國革命每一個階段的具體策略問題相聯繫的。如果他在革命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那末他在具體的革命策略問題上，也就不能不犯錯誤。

斯大林在駁斥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胡說的時候，曾經特別說明了列寧主義的幾個主要策略原則：

「第一，在制定共產國際對於每個國度工人運動底領導指示時，務須要考慮到這些國度的民族特點與民族特殊性之原則；」「第二，各國共產黨務須利用極小的可能以保證無產階級須有羣衆同盟者之原則，即使這個羣衆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也能；」「第三，務須考慮到這個真理之原則，就是爲了政治上教育千百萬羣衆，僅僅是宣傳和鼓動一項是不夠的，爲了這個目的，還需要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

（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斯大林接着又着重地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則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問題。斯大林寫道：

「雖然我們黨有思想上的增長，但是可惜的，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某種類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誠懇地相信，可以根據電報，可以根據某些公認的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來領導中國革命，而無須考慮到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文化、中國道德、中國傳統的民族特點。這些『領導者』與真正領導者的區別，就是不論任何時候他們的懷中總有着兩三個現成的、『適用』於一切國度和任何條件之下的所『必須』的公式。考慮到每個國度底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把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跟每個國度裏革命運動之民族特點聯繫起來的問題，使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適用於個別國度底民族國家特點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他們不懂得，在各國共產黨已經長大而成爲羣衆性的政黨的現在，領導底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掌握及善於把每個國度革命運動底民族獨有的特徵，跟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結合起來，以便促進和在實踐上使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目標能夠實現。」「因此，便企圖把一切國度的領導千篇一律化。因此，便企圖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的公式，不考慮到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具體條件。因此，在公式與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間便發生了永久的衝突，這些衝突乃是這些不幸領導者領導之基本結果。」「我們的反對派正是屬於這類可憐的領導者。」（同上）

斯大林這樣把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和中國革命策略的問題聯繫起來，而指出了並概括了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

一九二七年以來，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又是犯「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錯誤，也正是忘記了斯大林這個駁斥托洛茨基派的教訓，而認為領導中國革命，只需要他們的懷中有兩三個現成的、「適用」於一切國度和在任何條件之下所「必須」的公式就夠用了。考慮到中國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他們機械搬用若干的公式與中國的具體革命之間便發生了永久的衝突。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把自己限制在抽象的公式和簡單的歷史類比裏面，而不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上，或在這個時候犯了這個錯誤，或在那個時候犯了那個錯誤；又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按照具體情況的變化而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不能如斯大林所說：「爲了擊敗強大的敵人，就需要有無產階級的靈活和深思熟慮的政策；就需要善於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個空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十年內戰時期主張一切打倒，或者如毛澤東同志對他們的嘲笑：「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經在野了，你還要打倒他。」但在另一個歷史場合，例如在抗日戰爭的場合，他們却又轉到主張一切聯合，而否認抗日統一戰綫裏有左中右三派，否認我們黨對於這三派的政策應有的區別。又因此，他們也就不會按照具體情況去認真聯繫羣衆，而是對於羣衆實行一連串的命令主義。斯大林說：「必須要使羣衆自己根據親身的經驗去認識國民黨領導當局底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但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忘記了斯大林這個教訓，

以爲只要少數「領導者」認識，就可發號施令使羣衆跟着來了。斯大林說：「革命不僅是先鋒隊，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偉大』的『人物』所『幹』的，並且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大衆來幹的。」但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忘記了斯大林這個教訓，以爲革命首先、而且主要地是他們幾個自以爲是的「領導人物」所「幹」的。

三十年來的中國事變，說明了中國革命進行的極端複雜性與極端曲折性，而這種極端複雜性與極端曲折性，特別是由反帝鬥爭與反封建鬥爭的複雜地和曲折地交錯所引起的。這樣，也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策略問題，引起了統一戰綫的問題，引起了革命在城鄉之間關係的問題，同時也引起了軍事鬥爭重要戰略的問題。正如斯大林所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樣武裝鬥爭的進攻重點，在什麼時候需要放在什麼地方？是否在進攻中還有防禦或退却？進攻與防禦或退却如何互相結合？防禦或退却又如何轉變爲進攻？大家知道，這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乃是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和機會主義（時而冒險主義，時而逃跑主義）鬥爭的重要部分。

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叛變之後，發生了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時托派是主張冒險對上海進攻的。斯大林反對了這種冒險。當時斯大林說：「上海是各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交錯底世界中心。」斯大林主張要「在軍事上充分準備，盡量發展土地革命，進行緊張的工作，以破壞蔣介石的前綫與後方，然後再提出上海的全部問題」（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因爲「在不順利條件之下，要是不避免

（要是可以避過的時候）決死的戰鬥，這等於幫助革命的敵人」（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主張在力量懸殊的條件之下對大城市進行簡單盲目冒險的進攻，主張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要和敵人進行決死的戰鬥。

斯大林說：「有些同志以為在一切戰綫上同時進攻，是現在革命精神底基本徵候。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在目前（指當時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伯達註），在一切戰綫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不能把愚蠢和革命精神混為一談。」（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主張在一切戰綫上進攻，而把愚蠢和革命精神混為一談。

斯大林說：「不能把革命運動看作一直上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書本的非現實的觀念。革命總是曲綫進行的，它在一些區域裏進攻和破壞了舊制度，而在其他區域裏却遭受到局部的失敗，實行退守。」（「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認為革命只能是筆直上升的運動，革命的進行是不能有什麼曲綫的，因此，他們就認為要進攻的話，就只能全綫進攻，或叫做「全綫出擊」。如果有人主張要在一些區域進攻，而要在另一些區域退守，那末他們就要「斷定」那是「機會主義」的。

斯大林說：「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務放在自己身上，這會有支持不住的危險。」（「與

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當我們革命力量還很不足的時候，主張一下子把「一切打倒」、「全綫進攻」的一切任務，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切任務，都放在自己身上。如果有人批評這種做法「會有支持不住的危險」，那末，他們也就一定會給人家戴上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

很明顯，一九二七年以來，我們黨內一些先後犯各種機會主義錯誤而反對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同志，不論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或革命策略問題上，不論在政治問題上或在軍事問題上，都正是忘記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駁斥托洛茨基派的各種教訓，因而使我們革命的進行嘗過了不少的苦頭。

四

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終於在曲折的道路上，克服了客觀的困難和主觀的錯誤，而把革命進行到勝利，就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關於中國革命策略問題，是追隨斯大林的學說，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並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發展了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內，就極力堅持列寧斯大林的思想，主張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以支

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十年內戰時期內，在當時的土地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同志則又始終不忘記反帝國主義這一個極端重大的政治因素，而反對了「左」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同志關於建設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計劃，以及所規定的對各階級的政策如爭取中間階級等等，都正是把反帝國主義這一個因素計算在內的。在抗日戰爭時期中，毛澤東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必須發動農民羣衆才能使抗日戰爭得到廣泛的羣衆基礎，才能使抗日戰爭有成爲人民的勝利的可能，因此就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作了極頑強的鬥爭。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在各個時期內爲列寧斯大林的學說的實現而進行的這些鬥爭都是正確的。

不錯，應該說明這麼一個事實：不論是在一九二七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礙在中國黨內散佈和宣傳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又因爲文字的條件，反革命的隔離，就使得我們黨內許多在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同志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閱讀到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才在我們黨內有系統地編輯出來，而在不久以前，並經過毛澤東同志規定編出「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書爲十二本幹部必讀書之一。

毛澤東同志有機會寬泛地閱讀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種著作。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

在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就說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給他的重要的啓發。毛澤東同志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一個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毛澤東同志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發揮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而在他這部著名的戰鬥著作裏面，一方面迎頭痛擊了關於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夢想，另一方面則迎頭痛擊了企圖使無產階級追隨資產階級的黨內機會主義。

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以來所寫的許多著作裏面，特別喜歡咀嚼斯大林關於「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句名言，又特別喜歡咀嚼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一句名言。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情況，把斯大林這兩句名言聯繫起來，加以發揮，而嚴厲駁斥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機會主義者忽視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戰爭這一個最基本的觀念與政策。

爲着準備我們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發動了我們黨內的整風運動，這時毛澤東同志特別喜歡反覆引用了斯大林那部在思想上武裝全世界布爾什維克的傑作——「論列寧主義基礎」裏面關於理論與實踐相互關係的兩句話。毛澤東同志說：「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毛澤東同志應用了斯大林的前一句話，去反對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而應用斯大林的後一句

話，去反對我們黨內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同志把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件和「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列爲我們黨整風運動最基本的文件。毛澤東同志爲着使同志們能够深思熟慮斯大林這兩個文件，特別作了一次很長的演講，他認爲這兩個文件是一致的東西，是一百年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革命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們黨二十幾年的經驗，對於這兩個文件，逐條逐條地加以解釋。這兩個文件在我們整風運動中是給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以沉重打擊的。

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文件中，號召我們黨內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聯共黨史」爲中心教材。毛澤東同志寫到：「『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毛澤東同志是斯大林的學生和戰友。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够成爲斯大林的優秀學生，能够成爲中國革命勝利的領導者，也就是因爲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他用斯大林的方法去學習斯大林，這種方法就是如斯大林在爲列寧五十壽辰而作的名文中所說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

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周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拿引證和成語來作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作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底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的，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所以斯大林的思想 and 學說，一到了毛澤東同志的手裏，也就「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在我們黨內，有些人，這些人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在主觀上或許是想學斯大林，可是他們是用反斯大林的方法去學習斯大林，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的方法也就是如斯大林在為列寧五十壽辰而作的名文中所說的教條主義者：「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的計算來作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作工作的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於那個常欺騙他們的「厄運」。」

斯大林的學說，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論，經過毛澤東同志的介紹和運用，極大地啓發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廣闊眼界，提高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自覺，幫助我們黨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可以打敗任何反革命和任何阻礙革命前進的敵人。

我們已獲得一個革命的勝利。我們需要繼續勝利。但如何能夠保證我們的繼續勝利呢？正如毛澤東同志經常所告訴我們的：我們必須善於學習，必須善於向人類偉大勝利的旗幟和我們的導師——斯大林學習，善於向偉大的聯共黨學習，而我們學習的方法就是要像毛澤東同志一樣，用馬克思的方法，用恩格斯的方法，用列寧的方法，用斯大林的方法，一句話，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

還是重複毛澤東同志十年前在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時所說的話：「我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

向斯大林學習——這仍然是我們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時的重要結論。
爲着人類的幸福和將來，至高無上的、光榮的、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一九四九年）

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

「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

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當時的情況，一方面是中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強大高漲，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在上海襲擊革命並在南京實行屠殺，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則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叛變革命。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蔣介石底政變是表示民族資產階級之退出革命。」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形成了新的調動，新的分野，新的結合。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變化的新形勢，向中國共產黨，向中國無產階級，向中國人民，進一步地提出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著作中，根據他對於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性質的分析，概括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出了中國有兩條發展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說：

「中國事變底發展有兩條道路：

或者民族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進攻革命，以便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來結束革命。

或者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鄉千百萬羣衆以克服民族資產階級底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底軌道上，伴有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二者必取其一。」

這是斯大林同志的極端英明的指示。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就是說，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打敗無產階級，那末，就會使中國革命陷於失敗，使中國繼續處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繼續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屬品。這是一條道路。反之，如果中國無產階級能够繼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那末，中國便將獲得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完全勝利，而逐步過渡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又是一條道路。

就是說，兩條道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失敗的道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是否還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呢？斯大林同志說：「二者必取其一。」其他什麼「第三條道路」是並沒有的。

斯大林同志說：「這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二十五年

來中國一切歷史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天才的結論。

決定兩條道路的問題，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明了的，乃是關於領導權或是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問題。從中國無產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時候起，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已經有了三十來年的歷史。從一九二四年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成立革命的統一戰綫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的這一個時期，便是一方面是革命的聯合和另一方面是關於領導權的鬥爭——這兩個方面互相交錯的歷史。斯大林同志指出：「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買辦資產階級）是與革命一道前進的。這是全民族聯合戰綫底革命。」「這並不是說，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不會有過矛盾。這只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支持革命時，竭力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革命，使革命主要循着奪取地盤的路綫進行，並且限制革命底規模。」

可是，在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有了最致命的弱點。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軟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對革命運動規模的畏懼。」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取得城鄉勞動羣衆的援助，它害怕農民革命並反對農民革命，這樣就造成了它在國內的孤立的地位。無產階級却相反，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無產階級底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它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之增長。」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恰恰就是無產階級獲得和鞏固領導權的決定性的優點。它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够領導農民的解放。

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不只是在國內條件上，而且是還在國際的條件上。中國的革命正是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處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已是百孔千瘡，搖搖欲墜。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從那裏找到一個靠得住的靠山的。但中國無產階級却相反：自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世界已經出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正如太陽方昇。中國無產階級的朋友遍於全世界，首先蘇聯是中國人民最可靠而強有力的朋友。這種國際的條件，對於中國革命的鬥爭來說，是完全有利於無產階級的。

斯大林同志明顯地指出：「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存在——這一專政底經驗，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順利地利用——大大地便利於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實現的可能性。」事實就是如此。

斯大林同志當時一方面反對了叛徒托洛茨基派企圖跳越過中國革命所正處的階段及其所提出的獻媚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種種主張，一方面反對了叛徒陳獨秀派遷就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的種種政策。這些叛徒們當時表現的形式雖然不是一樣的，但他們的活動都是在於破壞中國革命，把中國革命引到失敗，以適合於帝國主義者、中國封建勢力和一切中國革命敵人的目的，而隨後這些叛徒也就很快地在這個目的上完全結合而為一體了。斯大林同志駁斥了這些叛徒們的胡說，而認為必須竭力鞏固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率領廣大的城鄉勞動羣衆，利用國際有利的條件，把中國革命推向第二條道路上前

這。就是說：「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是在於爲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的勝利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說：「數萬萬勞動羣衆的積極性之增長乃是革命勝利的主要保障，而工農的武裝，乃是反對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劑。」但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堅持共產黨在革命統一戰綫中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照斯大林同志的話說來，「這是保障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

但是，中國革命是在極爲曲折的道路上前進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中國革命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比起俄國革命要遇到更多得多的困難，在這一革命進程中的投敵和叛變比起蘇聯內戰時期將更多得無比。」在蔣介石叛變以後，罪惡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拒絕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繼續否認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綫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敢放手地發動羣衆和武裝工農，他們在農民革命和武裝工農面前完全表現出叛變的行爲，結果就促進了武漢政府的叛變，而使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遭受到失敗。

雖然如此，我們黨却根據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革命路綫，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不顧資產階級的叛變，獨立地開闢了廣闊的土地革命的道路，把革命推進到新的階段。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革命從城市退却到農村，而又把這種革命的正確的退却和正確的進攻結合起來，使這種退却轉而變成了新的進攻。

完全如斯大林同志的估計：「這種土地革命將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及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斯大林同志寫道：「蔣介石底政變表明着：從此以後，在中國南方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由於陳獨秀的妥協政策和汪精衛的叛變，武漢這個革命中心沒有繼續保持下來，但是斯大林同志的預見完全是正確的。在汪精衛繼蔣介石而叛變以後，革命的中心由武漢轉移到農村革命的根據地。於是，在整個中國便造成了這樣一個形勢：一方面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反革命營壘、反革命政府、反革命軍隊、反革命中心，但另一方面，則是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革命營壘、革命政府、革命軍隊、革命中心。這個革命營壘、這個革命中心，雖然開始在地區上的面積還不算很大，但是因爲它是建立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基礎上的，所以它的力量乃是無限的，它是必然要逐步擴大，成爲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奪取全國政權的出發點。而相反，蔣介石這個反革命營壘，這個反革命中心，雖然一時是很猖獗的，這個反革命統治雖然一時佔有很大的面積，但是，因爲它在人民中是孤立的，所以在長期進行反革命的戰爭當中，它的力量就必然要逐步削弱，它是一定要滅亡的。

蔣介石集團在其反革命的過程中，殘酷地掠奪人民，堆積了龐大的財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即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官僚資本集團。這個官僚資本集團的主要後台老闆是美英帝國主義者，但這個集團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這是表示蔣介石在人民中更加陷於孤立的地位。

在中國人民偉大的覺醒的力量壓迫之下，同時也由於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

在遠東的爭霸，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無可奈何地和不得已地參加了抗日戰爭。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中國在這時候重新出現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但是在參加抗日的資產階級當中，已經很顯然地分爲兩個有差別的集團：一個即是以蔣介石爲首的、當權的、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一個乃是不當權的民族資產階級集團。

顯然，中國共產黨這個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正如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所建立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一樣。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駁斥叛徒托洛茨基派胡說的時候，曾經這樣指出：「中國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把持着工業、商業和交通底命脈；帝國主義底壓迫不僅觸到中國勞動羣衆，而且也觸到中國資產階級某些階層；中國資產階級因此在某些條件下和某一時期內能支持中國革命。」（「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因此，中國共產黨這個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這個民族統一戰綫在一九二七年被資產階級自私的目的所破壞。然而日本侵略者打進來了，企圖把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這樣又引起了國內外的新的形勢，也引起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新的變化，這個新的形勢就又必要重新提出了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而且有可能建立一個很廣泛的

抗日統一戰綫。

當然，在這個抗日統一戰綫中，仍然如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所指出的，充滿了關於兩條道路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依然是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特點，並且一天一天地激化起來。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問題上一方面是人民的路綫而另一方面是反人民的路綫之間的鬥爭。當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被迫抗日而和他建立統一戰綫的時候，即已根據他對於人民的極端仇恨而準備他在以後的叛變。共產黨在它的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在這個統一戰綫中所採取的政策便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是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是充分放手發動羣衆和充分放手發展羣衆武裝的政策，而這樣的政策就正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所提出了的政策。顯然地，只有拒絕當時右傾機會主義的軟弱無能的政策，而採取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才能够發展人民的抗日力量，才能够以獨立自主的精神發展根據地，才能够堅持抗日戰爭，孤立蔣介石這個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並打退蔣介石幾次反革命的進攻。這就是爲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使這勝利成爲人民的勝利而鬥爭，爲中國革命的第二條道路的勝利而鬥爭，而避免一九二七年的覆轍。

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有政治路綫的鬥爭。抗日戰爭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一般地還是跟隨蔣介石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而想在政治上

經濟上從官僚資產階級那裏得到一點小利益。只是由於蔣介石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的不斷的吞併和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才在政治上逐步地形成爲比較公開的中間派。但是關於中國這個國家是要成爲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或者成爲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兩條道路，則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是鬥爭了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不滿意蔣介石的集團，但想走的還是前一條道路。無產階級估計到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爭取它站在抗日和人民的方面，而不去站在蔣介石反革命獨裁的方面，同時，則批判了它的動搖和它的反動夢想。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地領導農民羣衆和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向着自己所要求走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同志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便是在這個時期中關於兩條道路問題激烈鬥爭的產物。這個著作根據斯大林同志的理論，指出了那種在中國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迷夢的破產，而中國革命必然走的，只能是第二條道路，即由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爲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個階段，再使之發展到第二個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同志這個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爲武裝的傑出的著作，也就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使我們能夠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日本投降以後，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公開地叛變人民，窮兇極惡地向人民宣戰。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感覺到民族工業在

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四大家族的壓迫之下已陷於沒落的災難，也感覺到蔣介石的統治已經不可避免地要滅亡。但民族資產階級却害怕羣衆的革命，它的代表們曾經散佈了所謂既不是蔣介石國民黨的道路又不是共產黨領導的道路而有什麼「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就是說，他們仍然夢想一個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而是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及時地批判了和揭穿了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反動幻想，同時也估計到民族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及官僚資本的矛盾，而認為還有爭取它到革命方面來的可能，因而採取了爭取它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羣衆，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去對蔣介石匪幫作戰，而歷史的事實恰恰很快地證明了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完全破產。偉大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其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獲得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支持，終於戰勝了蔣介石匪幫，完全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狂妄的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建立了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說，中國革命走的正是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偉大著作中所指出的第二條道路。

一九四九年九月間，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與其他階級的代表們共同擁護了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共同綱領，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成爲中國人民民主戰綫的一個組成部分。

共同綱領規定了我們的人民民主戰綫和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由工人階級領導，而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國營經濟爲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各種社會經濟成

份都必須服從國營經濟的領導，投機事業要受嚴格的取締。共同綱領的道路正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徹底完成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事業而逐步過渡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既然和其他的代表們一道舉手通過了共同綱領，就有信守共同綱領的義務。兩年多以來，民族資產階級在發展經濟事業的方面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方面，是表現了它的一定積極性的。但是，兩年多以來，很多不守法的資產階級分子竟然不守信約，從他們的唯利是圖、投機取巧、損公利私、損人利己的本性出發，一方面向我們的國家機關以及羣衆團體派進了他們的坐探，另一方面又用卑鄙勾引的手段把國家機關和羣衆團體中的某些工作人員變成他們的代理人。他們用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犯法活動，向我們的國家、向工人階級、向全體人民，進行了猖狂的進攻，破壞了我們國家的許多建設工作。這些也就是說，這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考慮他們關於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統治的企圖和夢想。在歷史上已經有了多少次的破產，而當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們竟然又夢想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奪這一個由偉大的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經過千百萬人民流血犧牲而得來的人民共和國，夢想阻止這個偉大的人民共和國準備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而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很明白，如果我們不打退這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這種狂妄的進攻，那對於我們國家是很危險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指出了在革

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又指出了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攻擊，可能腐蝕一些革命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同志指出了黨必須有充分的警惕性。

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在最近幾個月來在國家機關中所進行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以及我們在私人工商業中所進行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這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運動，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鬥爭。這一個鬥爭是為鞏固我們國家的財政經濟紀律，同時也是關於中國走向那一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教育了工人階級，教育了廣大的人民，打退了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猖狂進攻，而在廣大的覺悟羣衆的監督下，將使資產階級不敢再放肆地違法犯法。這一個鬥爭進一步地保證着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回憶了中國革命這一切的歷史，以及現在鬥爭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事實，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指出的「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這樣一個偉大的科學預見。而且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三反」「五反」運動後也還是會要存在的。

當然，我們現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除了那些罪大惡極的大盜竊分子以外，還是聯合的政策，還不是要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但這個聯合唯一的標準，乃是民族

資產階級要認真地擁護工人階級的領導，認真地執行共同綱領，保持和發展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的積極性以及參加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積極性。就是說，資產階級必須按照工人階級所指出的有利於人民的道路上走，而不能按照那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所謀劃的不利於人民的道路上走。如果資產階級按照工人階級所指出的道路上走，認真地擁護工人階級的領導，認真地執行共同綱領，積極地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去經營自己的事業，那末，在現階段就還有它的積極性，對於國家就還能够有益處。反之，如果資產階級違反共同綱領，還要像其中的不法分子那樣，損公利私，化公爲私，有些人甚至把自己變成大盜竊犯，而破壞國家的建設，那末，他們也就沒有什麼積極性，對於國家就沒有什麼好處，而只是犯罪。

資產階級企圖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實際上只是要使中國回復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但是，很顯然的，資產階級如果要繼續它這個企圖，是必然地要徹頭徹尾地失敗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力量是這樣的強大，中國的廣大人民是這樣牢固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中國有這樣強大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我們又有這樣強大的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支援，這些就使得資產階級任何人如果有任何不利於我們國家的罪惡的活動，都將碰得皮破血流。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所發表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早已指出：「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就是說，中國只能走一條道路，這就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中所指出的第二條道路。毛澤東同志根據了和發展了斯大林同志的革命路線，把我們國家引上了這個最正確的道路。這是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限生命力，而使我國能夠走上無限繁榮和無限強大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偉大著作中關於中國革命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這一個思想，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照耀中國共產黨人所走的道路。中國革命事變的發展，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預見而發展的，這正是證明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偉大著作的偉大的歷史意義。但是這篇著作所提出的以及所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不但對於中國革命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於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都是有偉大的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著作，都是對於中國革命的極重大的貢獻，長時期以來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頭腦。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也即是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學說的勝利。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好好地研究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特別是研究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用以不斷加強戰鬥和工作的力量。我們紀念斯大林同志「中國革命問題」這個偉大著作的二十五週年，我們就更懂得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指示的重要性。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努力學習斯大林的學說是我們的任務

——在馬克思列寧學院追悼斯大林同志大會上致詞

同志們，全世界勞動人民偉大的天才導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同志和我們永別了！這位不朽的巨人為世界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一生的力量。他和偉大列寧的事業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他的光輝的無邊的智慧將永遠照耀在人間，他的英名將永遠是人類勝利的旗幟。

為着悼念斯大林同志，毛澤東同志曾經指示我們，要無限地加強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友誼，更加緊學習斯大林同志的學說。

很顯然，加緊學習斯大林同志的學說，是馬克思列寧學院全體同志更為特別的任務。如果馬克思列寧學院的同志們沒有努力把斯大林同志的學說學好或者學得更好些，那就是辜負我們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那就是沒有遵循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那就是我們不夠稱為馬克思列寧學院的學生和工作者。

斯大林同志的學說是代表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最高峯。不論在馬克思主義的

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以及關於無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略等等一切方面，斯大林同志都給了非常特出的嶄新的重大的天才貢獻。正如馬林科夫同志所說的：「斯大林同志是當代的偉大思想家，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斯大林的名字與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名字並列而無愧。」從斯大林同志的學說中，我們能夠得到馬克思主義所已有的和新發展的一切真理。如果我們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去努力好好地學習斯大林同志的學說，不去領會斯大林同志的教訓，那末，我們就將成爲落後的人，我們就將不能夠通曉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就將不能夠成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的論文中曾經說過：「馬克思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爲它正確。」這個說明對於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也是同樣的。斯大林同志在幾十年來指導蘇維埃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戰勝法西斯，指導全世界人民的解放運動，對一切人民的敵人和叛徒進行毫不留情的頑強的鬥爭，這一切工作和鬥爭所贏得的勝利，都表現了斯大林學說的萬能，而他的學說之所以萬能，正因爲它是正確的。

斯大林同志的學說對於我們的重要，這是毛澤東同志反覆不斷地說明了的。我們黨遵循斯大林的學說，在喬澤庫同志的指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現在我們在革命勝利之後要按照蘇聯的模範來建設我們的國家，顯然，斯大林同志指導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在我們這裏，也一定將是無往而不勝的。我們希望我們的建設工作做好，就



2 026 5666 0

必須經常認真地從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領取教益。

這就是說明，爲什麼好幾種學習斯大林同志的學說，乃是我們同志的任務，而對於馬克思列寧學院的同志們說來，更是特別的任務。

我想，我們同志們在各個時候都是善於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而去完成黨所給的任務的。現在我們也一定會善於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真正學通斯大林同志的學說，來紀念我們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來把我們偉大的國家建設爲像偉大蘇聯那種模樣的強盛和幸福的國家。

讓我們在偉大的斯大林的旗幟下百戰百勝地前進！

偉大的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五三年三月）